

# 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 20世纪马新华文源流马新史学发展分期刍论

**From "Nanyang Studies" to "Chinese Studies":  
Phases of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cal Stud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from Chinese Sources**

**廖文辉**  
(LEW Bonhoi)

## 摘要

在马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上, 华文源流的东南亚史学发展史, 向来少有人注意及此。它的源头可上溯至清末的边疆史地学, 经过 1930 年代一批南来学者的酝酿和努力, 而有南洋学会的创立, 确立了本土“南洋研究”的传统, 接着南大史地系的成立, 南洋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1970 年以后, 由于时变势移, “南洋研究”逐渐式微, 到了 1980 年代终于被“华人研究”所取代, 晋入另一新的学术风气了。但是不论是“南洋研究”或“华人研究”时期, 新加坡一直是马新华文源流史学研究的重镇, 此外在整个史学发展过程中, 华文报章的角色反而无关宏旨, 真正成为推手的是各式各样的史学、文史和社会科学的期刊杂志。这是它于马华文学史发展有所不同的地方。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o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based on Chinese sources has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among researchers. Its origin may be traced to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peripheral region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1930s, a group of scholars who had migrated from China established the Nanyang Studies Society and thus set the local tradition of Nanyang Studies. Subsequently, with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at Nanyang University, Nanyang Studies as an academic field was able to flourish. In the 1970s, rapid changes had brought abou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 Chinese community was thus more anxious to understand the various problems that they encountered. With declining interest in Nanyang Studies, it subsequently declined in significance. By the 1980s, it was replaced by "Chinese Studies" with a shift of emphasis 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 一、前言

众所周知，东南亚史（前称南洋史）乃至马来亚史成为一门学科，是相当晚近的事。早期马来亚史是附属于东南亚史而存在，东南亚史的研究早期主要是由东来殖民的欧美殖民者所进行，马来亚史的研究亦不例外。打从葡人占领马六甲开始，各种各类的官方文书及游记就陆陆续续的出现，但对马来亚进行较全面及完整论述与研究的，大概要从英殖民统治开始。1877年，致志于马新史学研究的新加坡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成立，并于次年起刊行学报，年出二册，为马新史研究树立了传统。所以欧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即已在马新树立了东南亚史和马来亚史研究的传统。而马来民族自《马来纪年》以来，也有其史学传统。那么马新华族以华文作为史学研究的工具，是否可构成一种史学传统呢？在文学领域里，形成了所谓的马华文学，而有马华文学史的研究。但在史学领域里，是否有马新华人史学的存在，进而有所谓的马新华人史学史的研究？

长久以来，马新一区的华文源流的史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及其流变，都被学者忽略而不注意及此。虽然此一研究传统的历史并不太久，无论如何它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并为本区域的史学研究作出了不容抹煞的贡献，应该足以形成一个研究课题。但遗憾的是有关的著述却屈指可数，印象所及有如下数篇。许云樵〈50年来的南洋研究〉（许云樵 1960：133-150）一文对此有所述及，此文不只谈中国和马新，也谈英国、荷兰、法国、美国和日本对南洋史研究的史学发展和概况。许云樵另外数篇文章

有专门谈及中国早期和马来亚独立前的南洋研究，即《南洋学报》的发刊词（许云樵 1940）、〈南洋研究与南洋大学〉（许云樵 1957：5-6）和《南洋研究》发刊词（许云樵 1959），这三篇文章都分别详略不同时期的南洋研究，并分成甲乙丙丁四个时期来处理。至于其他学者撰述的计有：杨进发〈廿年来星马历史研究的动向〉（杨进发 1967：295-296）、柯木林〈新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联合早报》，1987.02.08）等等。其它与之相关，但仅针对某一课题进行资料整理或论述的则有：韩都亚〈马来历史书籍简介〉（《南方晚报》1961.01.01）、许云樵〈1958年来星马各华文报新年特刊内的南洋研究资料〉（许云樵 1966：331-335）、许苏吾《南洋学会与南洋研究》（许苏吾 1977）等等，以上仅庠列数篇，余则不一一详列。

本文之目的即在于尝试建构近七十年来，马新华人史学工作者以华文作为著述工具所进行的有关东南亚史和马新史的研究概况或图象。希望通过以下粗略的分期，把近百年来华文源流的史学发展勾勒出来，是否言之成理，则有待方家有以教正之。

## 二、1930年以前南洋研究鸟瞰

马新华文源流的南洋史研究主要是继承自近现代中国的史学传统。清朝晚期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知识分子面对时艰，产生严重危机感，忧患意识重重。鸦片战争后，晚清的腐败无能，武备废弛，不堪一击，彻底曝露在世界面前。道光皇帝竟然不知英国位居何方，英俄相距多远，清廷对世界的无知，昧于世局，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田地。时贤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奏请改革、认识西方。时局的逼迫，国事的螭蟾，强调经世致用的经世史学逐步兴起。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意研究西方史地，为了反对侵略，筹边谋防，也兴起了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马金科、洪金陵 1994：49-50）。边疆史地学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时，就派衍成为中外交通史的研究（顾颉刚 1982：116）。早期，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主要侧重在西域诸国的研究，如：波斯和契丹等，印度和大食的研究也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另有一小部分的学者则注意及南洋华侨及史地的研究，但在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与前者相较均有不如。以后，这一支流的研究则逐渐脱离，并独立成为一新的史学研究，即是后来所谓的南洋研究或东南亚研究。基本上，早期的南洋研究仍然附属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投入者也比较少。这时期的南洋研究也因为研究条件的不理想，逐渐地将前此在南洋研究的领先地位让于外国学者，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但却仍有一些学者凭个人的兴趣与努力，在南洋研究的领域做了一些筚路蓝缕的工作，把有关南洋史地专书收入集刊，或就南洋史地进行考证工作（刘永焯 1994：29）。

许云樵曾将早期在中国的南洋研究之发展分成甲乙丙丁四个时代。甲时代是属“海客谈瀛”的时代，代表人物为何海鸣。何氏虽不曾到过南洋，但却凭过人的眼光在北京民国大学讲授“南洋华侨拓殖史”，并以一己之力艰难苦撑四年主编《侨务旬刊》。它于1921年4月1日创刊，共出了141期，内容有通论、通讯、侨务新闻、文艺和附录等栏（刘永焯 1994：29-30）。<sup>1</sup>这份刊物吸引了好一些留日的中国学生和海外华侨的投稿，并且出版专集两种，即《巴布亚荷领殖民地纪游诗笺》和《华侨开芭历代史略》，以作为“华侨丛书”（刘永焯 1994：29-30）。乙时代是属“《南洋研究》”的时代，代表人物为刘士木。刘士木建议设置暨南大学的南洋文化事业部，并为主持人，<sup>2</sup>这时南洋研究立足于大学里的研究机构，南洋研究终于有严整的阵容，有政府作后盾，先后编印出版了《南洋研究》季刊、《南洋情报》半月刊和《中南情报》半月刊，同时陆续出版了32种丛书，盛况一时无两，这可视为中国南洋研究进入有组织的开始（刘永焯 1994：30；梁志明 2003：11）。这个专门机构的成立，其目的主要是出版刊物，对海外侨胞进行宣传，鼓励华侨子弟归国深造，同时进行一些有关南洋问题的学术研究工作，它在全盛时期共有三十多位研究和工作人员。

以上两个时代的两个代表人物，虽然都各自主持一个机构，但美中不足的是本身著述很少，主要的贡献在疾呼提倡南洋研究和出版编印期刊及丛书。这时候他们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南洋的华侨，那是因为华侨对革命的贡献，因此给予介绍和揄扬。因为格于时代的使命，认识的不足，不

免以讹传讹，难脱传述的范畴（许云樵 1959；许云樵 1968：93-95）。

到了丙时代则属“尚志学会”时代，代表人物为冯承钧。<sup>3</sup> 他的著述不多，主要以翻译为主，但所选译的皆是西方第一流学者的权威名著，特别是法国学界的著述，沟通了中西学者的隔膜，打开了中国学术界在南洋研究的视野。他晚年校注的《诸蕃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海录》，以及编著的《中国南洋交通史》造福后学不浅。他从 1926 年起到他 1943 年去世为止，整整努力了十七年，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南洋研究才真正立定脚跟，站稳步伐，朝向学术疆域进军，摆脱前两期仅属“涉猎”的性质，正式踏入研究领域（许云樵 1959；许云樵 1968）。

前述的三个时代主要是由中国学者或归国华侨立足于中国而进行的研究。从第四个时代开始，亦即是丁时代，是南洋华人自己奋起研究的时代，南洋研究的中心才从中国转移至南洋来，此历程可以说是中国南洋研究的延续。研究人员主要是移居马新的中国侨民，即使是土生土长的马新华人，都曾经回返中国完成其学业，可说是中国培养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方向上以整个南洋为关怀重点，而不仅仅专注于华侨的研究。研究课题则细大不捐，包罗万象，大至国别区域，小至虫草鸟兽之名物考证皆在研究之列。<sup>4</sup> 这一阶段若依据其发展和演变特征再加以仔细区分，又可分之再三小期，即第一期的滥觞期（1930 年代）、第二期的开创期（1940-1955 年）、第三期的高峰期（1956-1969 年）。后段则开始于 1970 年迄今，称之为“华人研究”时期。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本土的学术研究人员逐渐成形，但研究取向却已从宏观式的南洋研究转向微观式的本土关怀，并且把焦距进一步的集中在华人研究方面。这一阶段可分为转型期（1970-1980 年）和发展期（1981-迄今）两小期。转型期的情况比较复杂，它同时是“南洋研究”时段的没落或终结期，又是“华人研究”时期的滥觞期。如果将之纳入前段，则它无疑就是“南洋研究”时段的没落期。如果将之纳入后段，则它就是“华人研究”时段的滥觞期。为此它可说属于前后两段的一个重叠过渡期，为了表示两段时期的继承与延续关系，故以转型期来名之。然而此期的学术趋向已转为偏重于华人研究，故此将之纳入后段来论述。因此，1970 年在马新华文源流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颇具意义的年份，

它可视为一个分水岭，前此为“南洋史”研究时期，往后则是马新华人的南洋史学研究已窄化至华人史和与之相关的专史研究，其中以马华文学史和华文教育史的论著最为兴盛，是为“华人史”研究蓬勃发展期。

简言之，马新华文源流史学发展史可分为“两阶段五时期”。两阶段是指前段的“南洋研究”时期（1930-1969）和后段的“华人研究”时期（1970年迄今）。五时期是指依据前后两段的演变和发展，再将其细分为各自有别的五小期。有关各阶段和各时期的详细名目兹列如下：

一、“南洋研究”时期（1930-1969）

（一）滥觞期（1930年代）

（二）开创期（1940-1955年）

（三）高峰期（1956-1969年）

二、“华人研究”时期（1970年迄今）

（一）转型期（1970-1980年）

（二）发展期（1981-迄今）

### 三、1930-1969“南洋研究”时期的史学发展

#### （一）滥觞期（1930年代）

1932年1月3日《星洲日报》开辟〈南洋研究〉版位，开始每星期定时刊载南洋研究的文章，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版位。因为它不仅为马新的南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发表的园地，同时也打响了马新史学研究的第一炮。当时许多有志于南洋史学研究的学人，纷纷于此为据点发表作品，无形中带动了南洋史研究的风气。〈南洋研究〉刊登的作品多为短小精悍之文，文字稍长，则截为数期刊登，除了述作，也有不少的译作。基本上文稿素质较低，还够不上学术论著。但无论如何，在马新华文源流的史学研究，〈南洋研究〉无疑首开先河。此外，姚楠也在《星洲日报》主编〈南洋史地〉和〈南洋文化〉，其性质与〈南洋研究〉相仿，皆为南洋研究之副刊。我们甚至在战后的华文报刊里也难以看到这种专门为南洋研究而量身订造的版位，有的只是综合性的文史版位。

基本上,很多学者在讲论马新史学率从南洋学会的成立开始谈起,而忽略了比之更早的〈南洋研究〉,即使许云樵也是如此。<sup>5</sup>在上述甲乙丙丁的分期和〈50年来的南洋史学研究〉一文中,他完全没有提及〈南洋研究〉。王赓武在《中国与海外华人》一书中亦如此,他如此叙述:“以1940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学会为新的起点……”(王赓武1994)也是以南洋学会为起点。〈南洋研究〉副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1937年8月22日停刊),只有不足六年的寿命,姑且不论其影响深度如何,但在著述上至少也累积了相当的厚度。这在本土南洋研究上可视为一开创性之举,同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事实上,1930年代在马新中文书写的东南亚史研究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深具本土意义的,不管是研究人员、学术活动、研究内容、出版刊印莫不在这十年内逐一涌现和成形。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东南亚史(当时称为南洋史)的研究、著述、出版和活动均以个别和零星的方式在进行着。最后,这些互不相统属、各自为政的学者和活动,终于在1940年汇集成为一股力量,而有南洋学会的成立和《南洋研究》的出版。<sup>6</sup>在这一段时期里,马新中文书写的南洋研究之开路先驱或领航者纷纷南来或崭露头角,并开始着手进行南洋研究,他们出版专著、发表论文、进行翻译,同时也成立出版社和搞人文雅集的活动。如果要把这十年的马新中文书写的南洋研究的时期称为酝酿期,应该不过亦不远。

在1930年代陆续南来的著名南洋研究学者计有刘士木、傅无闷、韩槐准、张礼千、陈育崧、许云樵、姚楠及关楚璞。刘士木(1889-1952),广东兴宁人,早年肄业于黄埔军官学校,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专门部殖民科。1938年买棹南来,在马来亚槟榔屿任钟灵中学图书馆主任(姚楠1995:171)。傅无闷(1892-1965),福建南安人,早岁参于革命,一生服务报界,历任厦门《民钟日报》、《小吕宋公理报》、《平民日报》、缅甸《仰光日报》等总编辑,于1930年代来新加坡(许云樵1965a)。至于韩槐准(1892-1970),海南文昌县人,于21岁完成高小学业,后因为经营染坊而债台高筑,只好在1915年只身南来。他先后从事书记、胶工和投资药厂,是众多学者中最早到马新一带谋求发展者。张礼千(1900-1955),江

苏南汇（今属上海）人，1930年代初期南来，曾在马六甲培风中学任教务长，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务主任，后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殖民政府勒令出境，1939年又重返新加坡，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归国。另有陈育崧（1903-1984），为马来亚槟城土生华裔，于槟城求学，十八岁时负笈集美中学，后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在新加坡陈嘉庚的公司任职。后来应英殖民政府之邀，出任海峡殖民地的华人视学官十余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因为涉及鼓励青年参加抗日运动与政府意见相左而辞职。许云樵（1905-1981），江苏无锡人，1931年廿六岁束装南来，从此定居于马新，不再回国，终老异乡。南来之初，他辗转任教于新山宽柔学校、新加坡应静芳女子师范学校、泰南北大年中华学校、中正中学高中部。姚楠（1912-1996），1935年作为上海振华油漆厂商务代表侨居于新加坡，于日军南侵时（1941年12月）回国，共逗留七年。关楚璞（?-1942），祖籍广东南海县，著名报人。

但不论是马新土生、于1930年代或之前南来的学人，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的在1930年代崭露头角，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活动。刘士木在南来之前即已在中国倡导南洋史的研究，并且还是个积极的先行者，可谓是南洋研究的首倡者。1927年，他受聘为暨大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主持编辑《南洋研究》期刊和《南洋丛书》的工作，这时期他有关南洋研究的编译著作约有三十二种。<sup>7</sup>

傅无闷在1930年代初期主政《星洲日报》，他锐意发展文化事业，提倡南洋研究，遂于1932年1月3日，开办了《南洋研究》副刊，供学者发表研究心得（崔贵强2001：132）。《南洋研究》的开办主要是受到上海暨大文化事业部的影响，将之从上海带进马新，延续它的研究传统。傅无闷在1930年代对南洋研究的推动可谓不遗余力，他不曾以南洋研究者自居，也未尝标榜研究南洋问题，但无疑的他确实是当时南洋研究的实际推动者。若非后来他转移志向，无法矢志不移的推广下去，相信必不能让刘士木之暨大专美于前（许云樵1965a）。

韩槐准于1934年读到中国和南洋关系史的书籍后，便留意起中国的外销瓷，透过他的好学不倦和刻苦自修，走入了东南亚的文物研究领域，成为东南亚博学多闻的文物收藏爱好者。由于他以往的工作关系，让他累

积了丰富的化学和药物知识。因此，其工作的最大特色是将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运用到其文物研究领域上。1936年，他将果园易名为“愚趣园”，成为1930-1960年代马新文人墨客、专家学者、艺苑名士雅集的场所。

张礼千在1939年再次南来时即在《星洲日报》社担任《星洲十年》编撰工作，并主编〈南洋经济〉副刊。当时一起负责编撰工作的还有关楚璞、姚楠、许云樵。《星洲十年》一书于1940年问世，该书卷帙浩繁，近百万言，内容丰硕，是一部年鉴性的书籍，为研究战前新加坡的重要参考资料（崔贵强2001：133）。《星洲十年》可说是他们第一次共同合作的努力成果，也是他们第一次撮合，为南洋学会的创立提供了先决条件。此外，张礼千也出版了译作《雷佛士传：新加坡开辟大伟人》（1939）、《英属马来亚地理》（1939）和著作《马来亚历史概要》（1940）。

陈育崧则于1935年与友人创办南洋书局，从事出版业，主要业务为编印马来亚化的教科书，同时也出版《南洋研究丛书》、《南洋杂志》、《南洋少年》、《南洋儿童文库》及《马来亚少年报》。南洋书局可说是马新一地最早专门出版南洋史地出版品的出版商。战后许多重要的东南亚史著述，大多数皆由南洋书局出版。此外，它在培育南洋研究人才和推动南洋研究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劳绩。后来他亲返上海设立南洋编译所，当时的硕彦如李长傅、何炳松、吕思勉等人均受礼聘，担任策划、编辑或顾问，同时又得暨大和中国科学社之支持，大量出版刊物，别树一帜。

许云樵南来之初，除教学工作，他一刻也未尝忘于读书和南洋研究。1933年许云樵前往北大年主持教务，于教学之余，埋身故纸，勾勒资料，并作实地考察，数年而成《北大年史》一书。由于他对暹罗史的研究情有独钟，在他南来前后，先后发表了译作《暹罗王郑昭传》一书；同时，他也完成了〈林道乾略居渤尼考〉，于1930年发表于《东方杂志》复刊第32卷第1期新年特大号；以及论文〈郑王入贡清廷考〉，皆为士林所重。此外，他与姚楠合著的《古代南海史地丛考》一书也由上海商务刊印出版。从1932年开始，即经常撰述一些有关南洋研究的专文，投稿于《星洲日报》的〈南洋研究〉、〈南洋史地〉等副刊。

姚楠于1930年代居留马新期间，曾先后主持编辑〈南洋史地〉、〈南洋文化〉、〈南洋经济〉等副刊。同时他也埋首收集资料和写作，或译或著，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东南亚史的鸿文（陈炎1996：4-10）。在《星洲十年》编委会成立后，虽然以关楚璞为首，但实际的工作则由姚楠来处理。嗣后，他与许云樵和张礼千继续留在报馆服务，负责有关南洋副刊的编务工作，直到1940年初为止（崔贵强2001：133）。在这段时间他的译作有《17世纪南洋群岛航海纪两种》（1935）。

关楚璞于1937年11月受《星洲日报》之聘，南来出任编辑主任一职，并主持笔政，撰文支持抗日；同时也重视副刊，以之为基地，积极地推动南洋研究，先后辟有《南洋史地》、《南洋经济》、《南洋文化》等副刊；又策划及主编《星洲十年》，1940年南洋学会成立时，他是七位发起人之一（柯木林1995：28-29）。

据以上的资料和叙述显示，1930年代对马新华文源流之史学发展上，实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代。如果将其轻率的以“草率肤浅，谬误百出”抹煞，甚至置之不顾，在研究马新史学的发展上是有欠妥当的。

## （二）开创期（1940-1955年）

1930年代后半期开始，《星洲日报》大力向中国罗致名士以厚植报刊的实力，此时关楚璞出任总编辑，郁达夫任副刊编辑，而著名的南洋史学者许云樵和张礼千分任史地版及经济版编辑。同时，以上数人又与姚楠合编《星洲十年》，这无疑为往后南洋学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许苏吾1977：2）。

1940年3月17日，这一批矢志于南洋史地研究的中国南来学者，加上刘士木，李长傅等人，终于在新加坡成立了中国南洋学会，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个研究南洋问题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该学会出版了《南洋学报》、《南洋丛书》、《南洋专刊》和英文《南洋季刊》。其中，由许云樵出任学报主编一职。研究范围包括东南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学会将会所迁至中国重庆，战争结束后才于1946年迁回新加坡。1958年，由于政治环境的转变，

经会员大会的议决，取消“中国”两字，正名为“南洋学会”。它的会员除当地学者外，也遍及全世界。南洋学会的创立标示了马新南洋史学研究有一个稳固的基地，《南洋学报》的出版代表了马新南洋史学研究正式进军学术领域和走向国际，使马新南洋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南洋学报》是马新东南亚研究领域内的第一本华文史学期刊，至今仍然出版不辍，是本区域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东南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其出版宗旨为“研究与发扬南洋文化学术”，并提供一个园地于学者发表他们的研究心得（许云樵 1940）。《南洋学报》每年出版 1 卷，每卷出 1 辑到 3 辑不等，所刊文章内容主要有：史地考证、考古资料、文献译述、史料钩沉、华侨史料、生物研究、人种探讨、民侨采访、言语专号、法律问题、教育论著、文化掌故、报业专史、纪念专辑、文献述注、统计资料、马华文学、佛教艺术、邮学津棣、人口问题、经济研讨、地方掌故、书评和文艺、文化消息、财务报告及会务报告等（许苏吾 1977: 4-5）。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致使马新的史学活动和研究停滞了近四年的光景。但是，撤退至重庆的南洋学会仍然继续其出版活动，在那里姚楠和张礼千出版南洋学会丛书七种，1946 年出版丛书一种。<sup>8</sup> 战后，南洋学会恢复活动，《南洋学报》也照常出版。这时许云樵除了继续主编《南洋学报》以外，还进入南洋书局，负责《马来亚少年报》和《南洋杂志》（1946 年 10 月创刊）的编务。前者的对象为青少年，每月两期，每期销量达两万份，很受欢迎。后者多以南洋的历史社会为主题，通俗与学术并重。这两份刊物随着许云樵离开南洋书局，不能再负责编务，不久后也停刊了（崔贵强 2001: 135-6）。

《南洋杂志》的刊物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虽然以“杂志”为名，但为文撰稿的都是当时南洋研究界数一数二的学者，如许云樵、张礼千、陈育崧、韩槐准、姚楠、许苏我和朱杰勤等人，所以里面刊用的文章皆有一定的水准，有者还是一时之选。出版《南洋杂志》是有见于战后能在马新定期出版的出版物不上十种，数量少得可怜。为了研究南洋的志趣，所以一班同好在志趣相投之下而毅然出版了《南洋杂志》。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

了《南洋学报》的出版，但学报是学术性、专门的，而且在内容上有所限制，不谈政治和经济。反观杂志则以通俗为前提，但专门的作品，如篇幅不长，也会酌量刊载，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它较不受限制，但是如果与南洋和华侨无涉的文章则敬谢不敏，因为杂志的使命是谈南洋，谈华侨（许云樵 1946：3）。因此，《南洋杂志》的文章多以南洋的历史社会为主题，通俗与学术并重。

以上三份刊物，可说个别代表了三个不同层面，《南洋学报》是属于学术层次的刊物，《马来亚少年报》则代表了青少年的通俗读物，而《南洋杂志》则介于两者之间，通俗与学术并重。这三份刊物只有《南洋学报》能继续其传统，出版不辍，另外的两份则天不假年，都分别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寿正终寝（韩山元 1983：83-85）。无论如何，这两份刊物或多或少也起了推动文史兴趣，影响了当时的一辈青少年。马新一些著名学者如马汉、梅井等人少时皆是《马来亚少年》的读者，对他们走上文史之路起了一定的影响（马汉 2003；陈云清 2003）。<sup>9</sup>

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一期的史学发展特色主要是以个人单打独斗，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为主。第二期以后，民间的学术团体开始涌现，并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为有志南洋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发表园地。

### （三）高峰期（1956-1969年）

1953年，在陈六使和福建会馆登高一呼之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高等学府的筹办如火如荼的展开了。1956年南洋大学开课，史地系也随之成立。马新南洋研究也在大专院校里有了立足点，除了吸引大批学有专长的南洋史学工作者进来，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研究环境，同时也进行培育后进的工作，使南洋研究的领域不致后继无人，其中颜清湟和杨进发即是其中的佼佼者。马新华人南洋史学的发展至此可说已逐渐成型，万事俱足。在民间有南洋学会和《南洋学报》的推动，在高等教育领域有南大历史系的推动，沛然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华人南洋史学研究的风潮。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还可从1960年创刊的《南洋文摘》所摘录的绝大部分与南洋研究相关的文章略窥一二。

本时期延续第二期以期刊出版为核心的史学活动，尤其是南大历史系陆续出版了好几种史学刊物，兹略述如次。

(1) 1960年11月编辑发行的《史地》，它的内容包括了历史与地理的文章，具有浓郁的本土色彩。这份史学期刊主要刊载东南亚史的研究论文，其中又以马新史的研究论文占大多数。至于其他地区之历史则仅有少数的几篇。

(2) 史地系历届毕业班皆有编印出版刊物的传统。这些刊物主要是刊载学生的作品、论文和游记感怀之文章，计有《泰行丛稿》（1960年出版）和《史地集刊》（1962年9月刊行）。前者刊载了一系列有关泰国民族、历史、文化和民俗等的文章；后者则偏重印尼中古与近代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以及好几篇有关日本地理的作品（崔贵强 1970：62）。

(3) 《史地观摩》由南洋大学史地学会于1963年6月出版第一卷。

(4) 1967年，另一份由南大历史系编辑出版的史学刊物《读史杂志》问世了，从第二期开始易名为《读史札记》，年出一册，全部是学生的心血结晶。其内容以普及为原则，涉及各国历史，但内容上较偏重于中国近代史的探讨。它的出版是因为“一方面是校方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是同学的热爱学习与研讨的结果”（崔贵强 1970：62）。

另外，南洋大学也出版了一些文史和社会科学期刊，其中也刊载了不少有关东南亚研究的论文，现叙录如下。

(1) 《社会科学研究集刊》由南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主编，创刊于1957年10月31日，是南大文学院最早的刊物。这份刊物虽然所刊载的论文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但其中不乏许多马新史学研究的论文。

(2) 1960年，南洋大学学生会为了庆祝首届毕业典礼，并展示其4年来学术研讨之进程和一贯热爱乡土之精神，主办了大学周，其中的一项活动厥为出版《大学周学术研究集刊》（南大学生会大学周工作委员会 1960b）。这份刊物是学生第一次出版的学术性刊物，里面刊载了15篇论文，其中有3篇是老师的作品，其余皆是学生的著述。其内容甚广，计有历史、社会、语文和政治等各方面（南大学生会大学周工作委员会 1960a）。历史方面的著述计有：许云樵〈日语汉字的音韵研究〉、叶钟灵

〈马来奴隶制度概观〉、颜清湟〈论邦格条约的订立〉等等。

除了南大的出版物，民间学术团体的出版也不遑多让。在史学期刊方面，最具分量的当数许云樵于1965年编辑出版《东南亚研究》年刊。这是他为了持续推动南洋研究而编辑发行的一份学术刊物。虽然这份刊物的出版碰上经费问题，但在许云樵的努力奔走筹措下，仍然出版了7卷，至1971年方始停刊，实属难能可贵（崔贵强2001：141；许云樵1965b）。此份刊物的内容不局限于史学研究，举凡天文地理、药学知识、鸟兽草木，只要与东南亚有关者，皆在选刊之列。其内容题类计有：植物探讨、药物常识、橡胶化学、文苑撷珍、史料钩沉、文献探讨、史地考证、星马掌故和图书述评等等。作者方面，除了许云樵本人每一卷都有两三篇的译作之外，其余的另有仰光大学的陈孺性讲师、东南亚民俗学研究者林英强，以及许云樵的几个门生如张清江、潘明智、洪国平等（崔贵强2001：141）。<sup>10</sup>

另外，还有如下两份是属于文史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刊物，其中也刊载不少有关东南亚研究的文章，也应当给予介绍。

（1）《南洋文摘》，创刊于1960年1月1日，至1973年12月停刊，持续了14年，共出版了168期。每一期由5至11个不等的专题所组成，这些专题计有：专载、新加坡人物志、史话、经济、文艺、人物志、通讯、风土志、文教、体育、各地风光、语文、影圈内外、宗教、考证、民族、音乐、电影、教育、掌故、动物志、艺术、南洋万象、医药、书评、新书介绍等。从南洋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到风土人情搜刮网罗，尽量使之无所不包，不致挂一漏万。因此，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南洋文摘》的创刊，其目的有二，其一是“养成马来亚意识外，还要养成南洋意识”，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最起码的一个条件便要熟识马来亚和南洋的事物”，所以“《南洋文摘》的创刊，对新马两地的读者来说，就为了要帮助他们去认识马来亚和南洋各方面的事物，从而养成马来亚意识和南洋意识；对南洋其他各地的读者来说，就为了要帮助他们去认识邻邦的事物，从而养成南洋意识；对南洋以外各地的读者来说，就为了

要帮助他们去认识南洋的事物从而增进他们对南洋的了解。”其二，企望透过这本文摘“掀起了读者们广泛的研究南洋问题的学术运动”（《南洋文摘》编辑社 1960）。

《南洋文摘》顾名思义，其绝大多数的文章主要是摘录自马新的报章书刊，也有部分是来自读者的投稿。《南洋文摘》虽然只是一份介绍南洋政经和风俗人情的软性刊物，但其中却刊载了不少当时或后来著名南洋史研究学者的学术论著，同时它所选刊的文章不只保存了当时许多重要的事件，也为往后的南洋史研究保留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和史料，从中可让我们一窥当时的学术风貌和南洋史学研究的趋势。

(2) 1968年9月，以杨进发、魏维贤、黄敬恭和李廷辉等南大师生为主的学人编刊出版了《新社季刊》，刊载的文章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其中也包括了部分东南亚和马来亚研究的文章，但仅出版20期就停刊了。

在学术团体方面，除了南洋学会，这时期民间也出现了另外两个学术团体。第一个是许云樵主持的“东南亚研究所”。这是许云樵离开南大后为了继续推动南洋研究而在1963年于其寓所内成立的，主要的活动是出版《东南亚研究》年刊。其次在1966年，一批热衷于学术研究的南大学人，响应新加坡政府的号召，以新加坡为立足点，立足本土，积极从事文史哲的研究。分别出版了三种期刊（《新社学报》、《新社季刊》、《新社文艺》）和多种文史丛书（翁世华 1973：65-77）。

不难发现，这时期仍然延续前此的传统，学术的生命力和推动力在民间，除了民间学术团体，民办的南大更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主力。除此以外，这时期史学发展的另一特色是大量的杂谈式和丛谈式的历史普及读物纷纷出版。这些著述具备了通俗易懂，文笔生动，短小精悍的特色，并以谈故道古、话掌故、说人物、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向国人介绍国史，蔚为一种风气。

此类著述大部分为可读性高且较不严谨的随笔式著述。它们有着深入浅出或浅显易明的特色，而且篇幅不长。若从当时的著述量来看，此类著述是当时最为盛行和广受欢迎的历史文体之一。这正符合当时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华人社会之阅读程度。这些著述所重各有不同，或重在人物，或

重在文化风俗，或重于一地之历史，或重在某一时段的历史，不一而足。由于数量较庞大，以下仅举部分为例，以概其余。如陈蒙鹤编译《敦霹雳传》、陈铁忱《新嘉坡史话》、刘伯奎《马来人及其文化》、刘强《马来人的文化》、梅井《马华名人传》和《马来丛谈》、刘子政《婆罗洲史话》、余寿浩《马来亚古今谈》、鲁白野（李华）《马来散记》、许云樵《马来亚丛谈》等等皆是。

在学术出版方面，与历史普及读物的出版相比之下就略见逊色。这时期的学术出版，不论在质或量方面，许云樵应是独占鳌头的，约出版了十七种之多。其余则有邱新民的《金沙江风物外纪》（1960）、《马来亚史前史》（1966）、《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1969）；崔贵强《东南亚史》（1965）；吴振强《东南亚史纲》（1966）等等。

#### 四、1970年以来“华人研究”时期的史学发展

##### （一）转型期（1970-1980年）

从前段第三期的叙述，我们可知不论是学术刊物的出版、民间学术团体的组成、历史著述的出版都可见其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可惜好景不长。1960年代或以前，华人南洋史学研究的蓬勃情景，到了1970年代已成明日黄花，一去不返。这时期的情况是南洋研究的中文史学期刊和相关著述的出版相对锐减，甚至停刊。加上南大开始变质，以至最终寿终正寝，这也意味着南大历史系的结束。在马来西亚方面，五一三事件之后，大马华社历经1970年代前所未有的政治低气压。这时期华文源流的史学发展乏善可陈。

虽然新加坡大学在1970年出版了中文版的《东南亚研究学报》，但这时期停刊的期刊却有四种之多，计有：《东南亚研究》（1971）、《南洋文摘》（1973）、《新社季刊》（1974）、《读史札记》（1979）。另外，1960年代创立的新社，从1974年开始，不论在会员人数或活动方面，因为组织内部人事的异动，再加上其性质又与南洋学会有重叠的现象，而面临会务停顿，甚至解散之窘境。直到1978年翁世华被选为主席，大局才

算稍定，但已盛况不再，大不如前（翁世华 1973：65-77）。

幸好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晋入 1980 年代，即迎来了另一段马新华文源流史学研究的新时代。

但是这一种学术风气的转轨并非突然冒现，实际上其背后涉及了相当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首先，战前许云樵等人所开创出的“南洋研究”传统，由于这辈学人相继故去和离开，就显得后继乏力，难以为继了。其次，自从 1969 年五一三事件以后，马来西亚政府在各个领域加速并强力推行单元化的治国方策。在政治上国阵成立，形成巫统独大的局面；经济方面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华人在经济上的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剥削；文化方面发布塑造国家文化基础的三大原则，使国家文化为单一的土著文化所主导；教育方面则继续执行 1961 年教育法令，变质英校及阻缓华校的发展。华人地位的低落，权益的流失，属独立建国以来未有的惨淡。经过了十年的压抑，华社开始酝酿一股反动的力量，企图一洗 1970 年代的萎靡士气，对本身族群在各领域的权益开始提出诉求。由此反映在文化领域的则是所谓的“八十年代华裔文化的觉醒”。华社本身主体意识的增强，无形中形成一股欲了解本身族群，研究本身族群方方面面的势头。这时候华人社会的学术研究方向和方向一面倒倾向于华人研究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而“发扬华人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铸造多元文化”就自然成为不言而喻的宗旨了。

可以这么说，1970 年代一方面见证了“南洋研究”传统的日落西山，也同时看到“华人研究”风气的旭日东升。一个已式微，另一正隐然成形，这也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何 1970 年代会出现一个青黄不接的十年。无疑 1970 年代是“华人研究”的酝酿发芽期，而引领这种转变并使之成为新一波的研究方向的学者，厥为南大历史系的学生，他们都是马新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华人学者。由于族群危机的出现，他们自然的就把注意力集中于本身族群上面，“华人研究”风气的形成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透过以下几位南大历史系毕业校友，或许我们能更清楚的看到这种转变的现象。颜清滢、杨进发、李业霖、吴振强和崔贵强等皆是南大历史系较早期的毕业生。1960 年代，他们皆曾笃力于东南亚史的研究，除了论

文，也出版了相关的著述：颜清湟〈马来农民穷困的根源〉（译）（1959）、〈论邦咯条约的订立〉（1960）、〈马来中古社会的土地和税收〉（1960）；崔贵强的《东南亚史》（1965）；吴振强的《东南亚史纲》（1966）、〈1824年的英荷条约〉（1969）等等皆是。然而，进入了1970年代，他们皆不约而同的放弃或减少在这方面的研究，转而专心致力于马新华人史的研究。这时他们的著述和出版有：颜清湟5篇以英文发表，有关马新华人与辛亥革命、马新儒学复兴运动和清朝在马新卖官鬻爵活动的论文；<sup>11</sup> 杨进发的《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1977）、《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分析》（1980）；李业霖的《林文庆传》（1972）；崔贵强的《吉兰丹的华人》（1976）、《星马史论丛》（1977）；吴振强（与柯木林合编）的《新加坡华族史论集》（1972）。至于其他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这时期的著述则有：林孝胜（1966毕）的《石叻古迹》（吴振强、柯木林合编）（1975）；李元谨（1970毕）的〈林文庆与邱菽园——马来亚华族社会的两个改良主义〉（荣誉学士论文，1971）、〈林文庆的思想〉（硕士论文，1974）；柯木林（1971毕）的〈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初探〉（荣誉学士论文，1971）。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是截然两分的，例如李业霖和杨进发在196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进行马新的华人研究，<sup>12</sup> 但李业霖也同时着手马新史的研究，如：〈关于马来西亚近代史的开端〉（1973）。以上所举诸例虽然并非完整，却有一叶知秋之效。这里要说明的是早在1970年代华人研究的倾向已经出现，南洋研究的传统已成强弩之末，而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实为首开其端者。

## （二）发展期（1981—迄今）

以1981年作为发展期的开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因为这一年马新史学泰斗许云樵不幸撒手人寰，他的离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与他同一时代的学人，如张礼千、姚楠等人所建立起来的“南洋研究”传统至此可谓中绝，一去难返，取而代之的是“华人研究”的新路向。许云樵的辞世，标志着马新华人研究的大纛已经举起，正式的从“南洋研究”的传统过渡到“华人研究”的时代。

跨入 1980 年代，尤其是前半段，马新两地的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这股逐渐成形的新发展奠定了往后“华人研究”的趋势，同时也意味向“南洋研究”的时代告别。对此，黄贤强有一段很透彻的观察，现全文征引如下：

新加坡方面，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于 1980 年正式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国大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便成为新加坡最主要的（在当时甚至是唯一的）研究新马华人的学术机构。在民间书写团体方面，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于 1982 年成立，成为本地除了南洋学会中外，另外一个主要以研究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新马和印尼华人）为主的学术团体。马来西亚方面，1980 年代初期也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所谓的“华人文化复兴运动”正式掀开。此外，吉隆坡开埠者叶亚来的历史地位也在这个时候受到一些非华人的置疑和挑战，引起华人社会的震撼，并促使华社更关注华人历史的研究和史料的收集。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后改称华社研究中心）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酝酿而成（黄贤强 2002：477-478）。

很明显的，不论是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以华人研究为取向的学术团体或组织，都在 1980 年代初期纷纷成立。进入了 1990 年代，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更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在马来西亚三所民办的私立院校先后创办，它们是位居南方的南方学院、盘据于北马的韩江学院、矗立中马的新纪元学院，它们都分别设有中文系，并积极着手进行马新的华人研究。南院方面除了培育英才之外，也负起保存及发扬中华文化的使命，所以分别于 1998 年和 2001 年成立马华文学馆和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为了提高学术活动的品质，也为了更完善的保存及发扬本区华族的史籍和文化，南院于 2003 年通过提升“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为“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并邀得中心原建议人郑良树教授为首任所长，进行潮人文化研究和史料收集整理的工作。目前此项研究经已取得一些成果，出版了

《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和《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等书。目前，“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正在推动的学术计划有如下数项：继续与华社各方言群合作，推动口述历史的学术活动，为华社保存先民史迹及史料；在《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和《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的基础上，参考各类史籍文献，从事《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之研究及撰述；与新加坡的华裔馆合作，从事《东南亚华校个案研究》的工作，首个工作将研究新山的宽柔中学；进行华团史的研究，继续努力搜求珍贵的特刊，并且列为研究所学术活动之一，一则为华社保存史籍，一则为研究者提供方便。<sup>13</sup>

韩院方面，华人文化馆在2003年6月30日正式设立，其目的是在培养更多研究人才和发展韩院成为研究海外华人历史的重要基地，它可谓集教学、研究、藏书和文物展示于一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2003.06.30）。新纪元学院方面则成立学术研究中心，聘请研究员，进行专题研究和推动学术研究，目前在进行的研究计划有《雪兰莪华裔青年价值观指标》、《许云樵书信和论文的资料整理》等等。新纪元学院学术处的研究取向，主要侧重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各领域，如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学与文化，这些恰好是国立高等学府所忽略的，可补其不足（新纪元学术中心2004）。2004年《新纪元学报》的出版，是新纪元学院在这方面的一个里程碑。

在东马方面，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它是于1900年正式成立，其创会宗旨主要在于推动及发扬砂州华族文化，进而促进砂州华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活动方面，则包括：研究中华文化思想体系，古风民俗，去芜存菁，使之成为州文化的重要部分；有系统地将华族的哲学、文化遗产、史实以及其他种族的文学著作通过翻译及书刊的出版，加以介绍及发扬；定期举办华族文化研讨会；关注及促进砂拉越华文教育之发展；发扬与鼓励华族传统音乐、美术及其他传统手工艺及民俗活动。在活动规划方面，特别强调对学术性活动的重视，并且将华族历史文化资料搜集及研究工作列为文化工作的长远目标。此外，还设有华族研究资料室一间，收藏书籍、剪报、专刊、历史文献等资料。有关的

藏书资料主要侧重于中文资料，有如下五个类别：刘子政著述系年目录；砂华文协副刊《艺盾》各期发表文章目录；砂华文协举办研讨会论文集目录；砂华文协现藏华文书刊目录；砂华文协现藏剪报目录。<sup>14</sup>

新加坡方面也毫不逊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1991年正式成立，其前身即南洋理工学院，成立于1981年。南洋理工大学于1994年正月正式设立中国语言文化系，并于四月间成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前者重在教学，后者重在研究，两相配合，以培养青年学子及促进学术研究为目标。<sup>15</sup> 其研究领域分成四大组：南洋华语和方言、南洋华文文学、南洋华族历史与民俗、文学传统与华族社会。目前已完成的研究计划有：新加坡华人家庭与婚姻演变、甲新华文墓碑神主史料汇编、二战后三十年新加坡华人宗乡组织的变迁、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初步考察、新加坡华人宗乡社群的文化认同——广惠肇碧山亭研究、新加坡早期（1832-1844）中文出版印刷史。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有：南洋大学历史和新加坡福建社群研究。同时也出版南大语言文化丛书，计有：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李元谨主编《南大学人》、李元谨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sup>16</sup> 此外，2003年南洋理工大学也成立了中文系，系主任李元谨特别提出了华人学的研究方向和概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南洋理工大学的中文系必定能在马新的华人研究大放异彩。

1995年5月新加坡宗乡总会创办华裔馆，并致力于将其发展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研究中心。而海外华人的传统、历史、信仰等各方面则是华裔馆的研究重点。1998年10月26日《海外华人百科全书》正式出版，它是华裔馆成立三年后完成的第一项大工程。华裔馆接下来的工作项目之一，是发展有关海外华人族谱的参考与服务中心，方便大众和学者查找任何有关华人家庭和宗族的资料，进而丰富海外华人研究的资源。<sup>17</sup>

各类相关论文和著述也陆续面世，并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产量较之1980年代以前，可谓大量的倍增。<sup>18</sup> 在众多的出版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的出版（1985年英文版，1991年中文版）。这本著述后来成为研究马新华人社会的经典，并且成为大专院校马新华人史课程的必读课本或教材。更为重要的是，两部通史性的著

述《马来西亚华人史》和《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分别于1983年和1998年相续出版了，其出版意义在于它可视为马新华社在华人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除了专著，相关的期刊杂志的出版也日见蓬勃。在1980年以后，出现了几份标榜以推动“马华文化”或“华人研究”为创办宗旨的刊物，计有《文道》、《愿景》和《文海》，三者皆属于较软性的文化杂志，比较适合一般读者阅读；而属于学术性的则有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本名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年改名为华社研究中心，简称华研。）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文道》创刊于1980年11月，于1994年12月停刊，总共刊行了一百多期，在华人文化界中，算得上是份寿命较长的文化刊物。它是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宗旨乃“发扬华人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促进各族文化交流，及铸造多元化之国家文化。”此外，它也可称得上是第一份专门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及文化问题的华文月刊。<sup>19</sup>

《愿景》创刊号则于1999年7月面世，它是由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文化团体，即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负责出版。其出版宗旨为“建设并发扬大马华族文化”；其目的为转播文化精神，也转播文化知识；其功能是培养更多“文化知识人”。其内容方面相当多元化，有“专题对谈”、“历史考证”、“学术论著”、“文化随笔”、“文学珍品”等等，要皆与华人文化有关。但不幸的是，这份号称“是华人社团出版的首个综合性文化期刊”的刊物，因为行销问题而于2001年4月出版了最后一期即告停刊，前后共出版了8期。<sup>20</sup>

除了上述两种，另有一份属于地方性的文化刊物，那就是《文海》。它是由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于1998年5月创刊，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刊物，至今共出版了4期。它的出版意旨和目的可以从其发刊词里一目了然：

《文海》的创刊，即是本会在推动砂华文化研究风气的一项尝试。  
……除了致力于华族文史资料的搜集之外，出版一份综合性的刊

物，不仅可以作为本会的喉舌，以对外报道会内的各项发展动态，同时也可以作为砂州华族文化工作者一个园地，以供他们发表研究成果或互相切磋交流。

所以《文海》所刊载的文章内容主要侧重于砂州华族文化、民俗和历史，这一点可以从已出版的《文海》反映出来。<sup>21</sup>

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是以刊载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文化之论文的学术期刊。它是在1997年8月创刊，由全马唯一以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为其主要研究范畴的学术机构“华研”编辑出版，其出版的目的在于促进马来西亚华人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游若金1997）。

至于其他与华人研究相关的期刊则有如下数种。首先是创刊于1983年的《亚洲文化》，由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这是一本专门刊载与亚洲文化相关之论文与文章的学报，所以它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法律皆在刊载之列。它是一本双语学报，除了马新学者，它也吸引了中港台，甚至欧美学者的文章。刊名虽为《亚洲文化》，但刊登的文章除了中国研究外，就以东南亚研究为主，其中又以马新研究占大多数。

其次是由华研在1992年创刊出版的《资料与研究》，是一份属于社会科学性质的刊物，但其中也不乏许多华人研究的资料、论文和翻译文章。它的出版，有如下几项宗旨：通过办一份思想性和知识性的杂志，来塑造一个理性的社会；通过杂志的刊载，使中心所整理和收藏的资讯，能够传布的更广，进一步突显中心成立的意义；反映本中心研究员对各领域的研究成果；通过杂志作为桥梁，使中心和华人社会及知识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2）。其内容涵盖面非常广，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和文学等等皆在选列之中。

其三是创刊于2000年，由华研编辑发行的《人文杂志》，这是一本人文导向的综合性杂志，它同时兼容轻松软性之文史短文和深度研究的学术论著。相对而言，《资料与研究》较偏重于社会科学领域和时事评论，而《人文杂志》则更倾向于学术研究和对人文学科的关怀。这一出版的意义

在于它为本土新一代的学人，尤其是诞生于1960和1970年代的年轻学人提供了一个发表学术论著的平台，这是一般报章杂志所不能提供的。马新华社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群不断的增长，而《人文杂志》的出现正好恰如其时满足了这样要求。可以想见，《人文杂志》培育了大量的本土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人，滋养了本土学术创作的领域。

1980年代以来，除了华人史研究方兴未艾之外，华人社会开始意识到对地方华人文物和史料保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注重治理地方志，不论是文献整理或是实物的收集和保存，渐渐形成气候。此外，各相关的组织和团体纷纷筹办和成立社区文物资料中心，并且积极的推动地方性的史学活动。相关的著述也在短时间内以相当惊人的速度出版，此起彼落，令人目不暇接。这其中又以新山，槟城和霹雳因为拥有出色的史学工作者，遂形成治地方史三鼎分立的景观。此外，在雪兰莪和砂拉越的地方史学也不乏出色兼具热忱的史学工作者在推动，所以也办得有声有色。这些以地方为本位的团体计有：砂拉越华人资料馆（1988）、砂拉越诗巫民众会堂文化馆（1992）、雪兰莪乌鲁冷岳社区文物资料中心（2002）、沙叻秀华族文物馆（2002）、陈耀威主持的槟城文史建筑研究室等等皆是。至于相关出版品则有：张木钦《荷兰街口夕阳斜——峇峇文化：一次文化统合的奇异经验》、万家安校编《英烈千秋——加影地区及牛骨头山殉难烈士简介》、林雁《永恒的虹影》、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李永球《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陈嵩杰《森美兰州华人史话》等等。<sup>22</sup>

## 五、小结：七十年来马新华文源流史学发展的特色

自从《星洲日报》开辟〈南洋研究〉以迄1969年，当时的南洋史研究并无泾渭分明的清楚划分为“南洋史”或“华人史”，反而更强调通盘式的研究。这可从《南洋文摘》有关南洋研究的文章主要以马来亚史为主，反而华人史的文章不是太多的现象反映一二。研究华人史的，通常对马新史乃至南洋史皆有一定的了解，反之亦然。可是时之今日，我们不只丧失这种南洋史研究的传统，即使以南洋研究著称的《南洋学报》也未能

幸免于难，只要查阅《南洋学报》从创刊至今的各期目录，就不难发现到了晚近二十余年，其刊载之文章绝大多数是与东南亚华人研究相关的论文，这与创刊初期所刊载的文章是有一定差距的。1970年代以来，南洋史的研究传统已逐渐被窄化成马新华人史的研究，许云樵一辈人所建立起来的研究传统，竟然面临后继无人的断层局面。此其一。

“南洋研究”时期对南洋研究所强调的宏观整体的研究和论述，在《南洋学报》创刊号〈发刊旨趣〉里，许云樵有很清楚的说明：

“至于研究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凡是关于南洋的一切学术，不论其为史地，为语文，为生物，为人种，为艺术，为民俗，为经济，为宗教……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许云樵1940）。

虽然如此，但实际上马新的东南亚研究主要仍以马新研究为主，对其他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仍嫌不足，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掌握在西方学者的手中。此其二。

长久以来，新加坡一直是马新华文源流史学研究的重镇，各期的起点都是开始于新加坡。酝酿期开辟〈南洋研究〉的《星洲日报》发行于新加坡、南来的学人以新加坡为立足点；开创期的南洋学会和《南洋学报》皆创立和发行于新加坡；高峰期的南大史地系的成立也在新加坡。马新分家以后，南洋学会仍继续在此活动，南大史地系除继续其“南洋研究”的传统，并引导过渡至“华人研究”时期。“华人研究”时期主要的研究工作都较多集中在新加坡，如新加坡国大中文系的成立，以及国大中文图书馆迄今为止仍是马新地区华文资料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1982年亚洲研究学会的成立；1994年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中华语言和文化中心和2004年中文系的成立；1995年华裔馆成立。许多著名的学者大多滞留在新加坡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在都展示这个传统的延续。因此不论是大专院校、研究机构抑或出版情况，在马新华人研究方面新加坡皆领先马来西亚。此其三。

从1919年《新国民日报》及其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同时创刊开始，马新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就肩负着推动马新华文文学的重任，成为马华文学发展的摇篮。但在马新华文源流的史学发展中，华文报章的角色反而无关宏旨，真正成为推力的是各式各样的史学、文史和社会科学的期刊杂志。<sup>23</sup>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1930年代，《星洲日报》之〈南洋研究〉、〈南洋史地〉等相关版位对当时“南洋研究”的作用，但随着这批主事的学人相继离开，组织南洋学会，出版《南洋学报》，使整个南洋研究的中心一下子转到期刊杂志，报章在这方面反而显得有点功能不彰。<sup>24</sup>此其四。

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副教授黄贤强在〈近二十年来新马的华人研究〉一文中认为1980年以来，马新两地的华人研究，其中一个相同的发展模式就是以大学为研究基地，以民间学术团体为推展动力（黄贤强2001：501）。这样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越往后这种趋势越明显。从1980年以前的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到现时的马大、国大、南方学院、韩江学院、新纪元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中文系，这些大专院校成为学者安身之所在，领导民间学术团体，共同推动华人研究。此其五。

马新华人研究经过学界这几十年的努力，其实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他们开拓更大的研究领域、更广的研究范围、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内容。从早期中国学人对南洋华侨研究到巴素博士的《马来亚华人史》以迄今的《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出版，从早期马新华人研究掌握在外人手中，到现在我们可以骄傲的说马新华人研究已经掌握在本地华人学者的手中。往后，我们除了继续拓展和丰富这领域的研究，同时也是时候把相关的论文结集出版成论文集了。

除此以外，有了上述简略的鸟瞰式分期，我们就能较清楚把握近百年来马新华文源流的马新史学发展之脉络，以及其发展的趋向所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针对每一时期做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汇编整理成册，然后再进一步做分析和研究，以期能建构一部马新华文源流的史学发展史。相信这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仍有许多工作留待我们来进行和完成。

## 注释

- 1 在许云樵 1959 和许云樵 1968 二文里,许云樵认为何海鸣主编《侨务旬刊》,苦撑三年。
- 2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建于 1906 年的南京暨南学堂,南京政府成立后,扩大为综合性大学,并迁校至上海,号称是华侨的最高学府,它除了设有大学部、中学部外,还设有南洋文化事业部。该部又称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一度改称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日本侵华期间,暨南大学迁至福建建阳,该部改称海外文化事业部。
- 3 冯承钧幼年出国,先后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1911 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科,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在 1930、40 年代是中国研究南洋的权威。所以称“尚志学会”时代,是因为冯承钧的译注,大多以“尚志学会丛书”之名义刊行。
- 4 魏月萍把这种历史书写形容为是一种“扩散式的宏观史学书写”,特点是“以世界体系作为一个认同的中心,采以散点式的历史聚焦点,并以‘马来亚’作为岛屿概念,突出了它与世界互动中的‘南洋’概念”。见 2003 年 11 月 22-23 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之论文〈从“离心”到“主体”历史意识的建构-独立后马华地方史初探〉。
- 5 许云樵在《南洋学报》创刊号的〈发刊旨趣〉有如下的一段感慨:“偶或有人提倡组织什么文化团体,但往往空雷不雨,难见实现,即使有些刊物乘便附设一栏《南洋研究》,不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便是草率肤浅,谬误百出;根本称不得提倡,谈不上研究。”这就不难理解,何以许云樵以南洋学会为马新华文源流史学的起点。他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立足点,《星洲日报》的《南洋研究》素质较低,自然属于“草率肤浅,谬误百出”一类,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了。但若斥之为“称不得提倡”,则不免苛责过严,傅无闷主持之《南洋研究》其目的实为提倡南洋研究,有开风气之功。或许也可用当局者迷的现象来解释,1981 年以前之马新史学莫不与许云樵有关,身在其中,反不如与其时代有段距离的局外人看的透彻明确。
- 6 南洋研究的首倡者刘士木和许云樵本互不相识,许云樵开始仰慕刘士木是在 1927 年刘士木出任暨大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而刘士木则是在拜读了许云樵的《暹罗王郑昭传》后留下深刻的印象。见许云樵 1952: 1。而许云樵和傅无闷本素未谋面,后经黄警顽先生的介绍才认识的。见许云樵 1965a。其他各学者的情况亦复如是,以上仅举二例以概其余。
- 7 有关书目,详见萧文增 1952: 12-13,此不赘述。
- 8 详细书目可参见许苏吾 1977: 3-16。
- 9 以上二文转引自 <http://www.kwongwah.com.my/wenhua/wh12.htm>。
- 10 各期文章之名称,可参看《东南亚研究》各期目录。
- 11 这五篇论文分别是: Ching 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J.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 No.25, 20-32 (1970.9);

-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Organis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1911, *J. Southeast Seas Society* Vol.29, Pts. 1 & 2, 47-67 (1974);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1911, *J.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7, No.1, 33-57 (1976.3); The Rol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1911 Revolution,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3, Nanyang University Press (1978);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19,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55-89 (1979.3)。这几篇虽为英文论著, 但却可以很好的说明颜清湟学术研究方向的转换。
- 12 杨进发的著述有: Chinese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载《新学报》, 第2卷, 页1-18(196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1900-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9, No.2, 页258-285(1968.9); 〈新加坡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层〉, 黄敬恭, 魏维贤合编《从开埠到建国》(南洋学会, 1969), 页27-45。李业霖则有《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索引》(新加坡: 南大南洋研究室, 1968)。
- 13 资料整理自 <http://sc.edu.my/ricec/ricecintro.htm>。
- 14 资料整理自 <http://www.hornbill.cdc.net.my>。
- 15 资料整理自 <http://www.ntu.edu.sg/cclc/research/CCLCIntroduction.htm>。
- 16 资料整理自 <http://www.ntu.edu.sg/cclc/research/Aboutus.htm>。
- 17 [www.sfcca.org.sg/Jianjie/Huayiguan/Index.htm](http://www.sfcca.org.sg/Jianjie/Huayiguan/Index.htm)。
- 18 近二十年来马新的华人研究成果, 其详细情况可参见黄贤强 2002, 此不赘述。
- 19 整理自苏庆华 2002: 295-297 和《文道》〈发刊词〉。
- 20 整理自苏庆华 2002: 303-305、《愿景》〈发刊词〉及其各期目录。
- 21 整理自苏庆华 2002: 305-306、《文海》〈发刊词〉及其各期目录。
- 22 1980年代以来华人研究蓬勃的气象, 除了前述期刊、专著、学术团体以外, 同时也反映在相关内容研讨会的热烈进行, 几乎每年都有举办, 有时一年好几回, 令人目不暇接, 尤以1990年代以后更为普遍, 类似的研讨会在1980年代以前是较少看到的。有关方面的资料, 尚需费时收集和整理, 本文未能及此, 仅能附注说明于此。
- 23 详细论述可参见拙作〈马新华文东南亚研究期刊杂志概览(1940-2003)〉(未发表)。
- 24 当然, 学科内在的差异和表述方式的不同, 或许也是报章功能不彰的一个原因。文学较偏于创作, 趣味盎然, 较受读者青睐; 史学则重论证, 失之枯燥繁琐, 兼且篇幅冗长, 报章版位有限, 较难容纳。

## 参考书目

- 陈炎 1996。〈风范彪千秋，英名传万代 - 沉痛悼念先师姚楠教授〉。《南洋学报》51。
- 陈云清 2003。〈曾松华：笔下说文化〉。《光华日报》，2003.02.07。
- 崔贵强 1970。〈南洋大学历史系〉。《东南亚研究学报》v1: 1。新加坡：新大历史系。
- 崔贵强 2001。〈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载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中研院。
- 顾颉刚 1982。《中国史学》。台北：新文丰。
- 韩山元 1983。〈许云樵与南洋杂志〉。《南洋学报》v38。
-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2。〈编者的话〉。《资料与研究（创刊号）》。吉隆坡：华资，1992.09.16。
- 黄贤强 2002。〈近二十年来新马的华人研究〉。载李元谨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亚洲研究学会、南大毕业生协会。
- 柯木林 1995。《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 梁志明 2003。〈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前瞻〉。载氏著《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永焯 1994。《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广东：人民出版社。
- 马汉 2003。〈陪伴我们成长的少儿刊物〉。《南洋商报》〈商余〉，2003.04.18。
- 马金科、洪金陵 1994。《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 南大学生会大学周工作委员会 1960a。〈发刊词〉和〈编校余审〉。《大学周学术研究集刊》。新加坡，南大学生会。
- 南大学生会大学周工作委员会 1960b。〈序文〉。《大学周学术研究集刊》。新加坡，南大学生会。
- 《南洋文摘》编辑社 1960。〈创刊词〉。《南洋文摘》v1: 1。新加坡：南洋文摘。
- 苏庆华 2002。〈马来西亚华族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出版的学术性刊物初探〉。载《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
- 王赓武 1994。《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
- 翁世华 1973。The Islang Society, Singapo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载《新社学术论文集》。新加坡：新社。
- 萧文增 1952。〈追悼刘士木先生纪〉。《南洋学报》v8:2。新加坡：南洋学会。
- 新纪元学院学术中心 2004。〈发刊词〉。《新纪元学报（创刊号）》。加影：新纪元学院。
- 许苏吾 1977。《南洋学会与南洋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
- 许云樵 1940。〈发刊旨趣〉。《南洋学报》v1:1。
- 1946。〈发刊词〉。《南洋杂志》v1: 1。新加坡：南洋杂志社。

- 1952。〈纪念刘士木先生〉。《南洋学报：刘士木先生纪念特辑》v8：2。新加坡：南洋学会。
- 1957。〈南洋研究与南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集刊》。新加坡：南大社会科学研究会。
- 1959。〈发刊词〉。《南洋研究》v1。新加坡：南洋大学研究室。
- 1960。〈50年来的南洋研究〉。载刘问渠主编《这半个世纪（1910-1960）：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檳城：光华日报。
- 1965a。〈悼念傅陈吴赵四老友〉。《南洋文摘》v10：10。新加坡：南洋文摘。
- 1965b。〈发刊词〉。《东南亚研究》v1。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 1966。〈1958年来星马各华文报新年特刊内的南洋研究资料〉。《南洋文摘》v7：5。新加坡：南洋文摘。
- 1968。〈从“南洋研究”说起〉。载《东南亚研究》。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 杨进发 1967。〈廿年来星马历史研究的动向〉。《南洋文摘》v8：5。新加坡：南洋文摘。
- 姚楠 1995。《东南亚历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游若金 1997。〈发刊词〉。《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吉隆坡：华研。